政法系统多项禁令促廉洁

针对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和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岗位环节

本报北京3月18日电 （记者**吴兢、石国胜**）今年以来，我国政法系统把队伍建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关乎政法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问题来抓，从严治队伍重拳频出：

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法官“五个严禁”规定，并公布举报电话。包括“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对违反规定的人员，一律调离岗位，并严格依法追究责任。截至2月底，全国各级法院共查处涉嫌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130余人。在已做处理的44人中，移送司法机关的27人，刑事处罚的4人，其他给予党政纪处分或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3月9日，7位资深审判长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首批专职廉政监察员，致力于加强对审判、执行活动的经常性监督。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数据显示，2008年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检察人员258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24人。今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推出了“十个严禁”。包括：严禁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严禁违反法定程序办案；严禁买官卖官、跑官要官，违反规定任免干部；严禁插手工程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经济活动；严禁用公款出国（境）旅游；严禁利用职权为特定关系人谋取利益等。

公安系统刚刚出台了《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五个严禁》。具体内容包括：严禁违规插手工程招标、政府采购、人事安排和案件查办，为本人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严禁近亲属在分管的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严禁出差、开展公务活动由企事业单位、个人接待，或者接受下级公安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安排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等。违反“五个严禁”的，将予停职、调离、免职、责令辞职等，同时受到党政纪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有关专家分析，这些“严禁”制度，都是针对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和最容易发生问题的岗位环节来设计的，涉及政法干警尤其是领导干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严肃政法纪律、纯洁政法队伍将发挥重要作用。

据悉，按照中央政法委部署，今年各政法机关将紧紧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问题，组织开展专项治理，清理队伍内部的害群之马。

大型系列丛书《学习理论文库》推出39位学者自选集

本报北京3月18日电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学习理论文库》出版座谈会上了解到，为充分展示新时期理论工作成就，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在中央领导同志倡议下，中宣部理论局、学习出版社从2002年开始组织出版大型系列丛书《学习理论文库》。目前，《文库》已分6批先后推出龚育之、邢贲思、苏星、邵华泽、王梦奎、金冲及、刘国光、吴树青、罗国杰、侯树栋、汝信、江流、冷溶、杨春贵、李文海、黄楠森、龚书铎、卫兴华、郑科扬、卫建林、郑必坚、虞云耀、刘海藩、王伟光、李君如、赵曜、袁贵仁、李慎明、赵可铭、许志功、戴逸、许崇德、陈先达、徐光春、魏礼群、吴敬琏、靳辉明、厉以宁、逄锦聚等39位专家学者的自选集，总字数1600多万字。今年正在组织实施第七批《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

《文库》是新时期广大理论工作者深入学习研究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果的集中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推进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是与这一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以他们取得的丰硕成果推动了这一历史进程。《文库》自选集收录的虽然是理论工作者个人的研究成果，但汇集起来，从总体上体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理论工作的成就，体现了广大理论工作者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的积极贡献，体现了理论界深入研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的重要作用。

《文库》是新时期广大理论工作者学术追求和学术风范的集中体现。《文库》的作者都是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和学术研究、有深厚学术造诣和广泛学术影响的理论大家。他们把自己的学术追求同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几十年如一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严谨治学，潜心钻研，实现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统一。他们的每一本自选集，展示的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理论精品，体现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党的理论事业的无比忠诚，也是他们锲而不舍地进行学术探索、不断攀登学术发展高峰的见证。

《文库》陆续推出后，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成为我国出版界的一个知名品牌。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文库》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最宏大的出版工程之一，它的成功出版为进一步做好理论工作积累了新的经验，今后要重视通过组织出版《文库》这样的重大项目和工程，更好地推动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的发展。

往返雪域高原卫星导航助飞

18日下午4时30分许，南航空客A330—300按照预设航路平稳精确降落拉萨贡嘎机场，之后返回广州白云机场。RNP AR高精度导航技术运用于大型宽体客机试飞成功。

RNP AR高精度卫星导航技术，让飞行员不必依赖地面导航设施即能沿着精准定位的航迹飞行，使飞机在能见度极差的条件下安全、精确地着陆，极大提高飞行的安全水平。尤其对于我国地形条件复杂的西部地区，其应用大大降低了飞机在山区机场运行时对天气条件的依赖，提高了机场的运行正常性和飞行安全性。

上图：客机在拉萨贡嘎机场起飞。

左图：飞行员在机舱中操纵设备。

本报记者 **李 刚**文 新华社记者 **壮 锦**摄

少说成绩多讲问题

汪金友

在研究起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路：“2008年政府工作成绩可以写得比往年少一些。要着重讲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讲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讲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具体的方向、目标、方法和措施。”

2008年确实有很多成绩可讲。战胜南方冰雪，抗击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圆满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历史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验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

但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不是过去的成绩，而是现在的问题。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农民工找不到活干怎么办？企业经营困难怎么办？农民增收放缓怎么办？城镇居民买不起房怎么办？农村百姓看不起病怎么办？一些食品不安全怎么办？一些干部不廉洁怎么办？这么多的怎么办，都需要两会来讨论，需要政府来回答。

为此，《政府工作报告》用大量的篇幅来分析当前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并对老百姓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逐个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让人民群众了解了全局，看到了希望。这种“少说成绩，多讲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务实观念，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和效仿。

俗话说，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成绩就像地上栽的树、路上修的桥，你看得见，别人也看得见。现在有一些干部，经常把自己的成绩挂在嘴上。开会讲成绩，汇报讲成绩，闲谈也讲成绩，一讲起来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这就有好大喜功和自吹自擂之嫌，容易让人反感。

有成绩，不等于没有问题。再大的成绩，也掩盖不了问题。问题虽然影响形象，但并不可怕。我们可以把问题分为四类，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是受外界影响所产生的问题，三是因为发展而引发的问题，四是自己工作疏忽而导致的问题。积极解决这些问题，是每个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既要解决遗留的问题，又要解决新产生的问题。尤其是个人工作失误造成的问题，更不能“以功代过”或“以功掩过”。不承认和不解决问题，只能扩大和加重问题。

不少问题与发展有关。发展得越快，暴露和引发的问题就越多。不仅生产、管理、制度会出问题，而且工作、学习、生活也会出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害怕问题而不去发展，也不能因为强调发展而回避问题。问题是负担、麻烦和障碍，同时也是发展的动力。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凝聚民力的过程。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特殊的困难，必须以特殊的态度来应对。其中一个受到老百姓欢迎的办法，就是“少说成绩，多讲问题”。无论多大的困难和多严重的问题，都一条一条摆出来。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客观公正地分析，开诚布公地讨论，才能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和勇气，共同应对危机。

外国驻京记者参观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览

“我是2006年从北京坐火车到西藏的，虽然只呆了9天，但走访了许多地方。西藏很美，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俄通社—塔斯社驻京记者基里洛夫说：“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展览向公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西藏。”

3月18日，31家外国媒体的51位驻京记者兴致勃勃地来到北京民族文化宫，参观并采访正在这里举行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览”。展览分“和平解放西藏”、“平息武装叛乱”、“西藏的民主改革”、“50年来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事业的巨大成就”5个部分，以客观、充实的内容呈现了西藏今昔巨变。

去年拉萨“3·14”事件发生时，西方一些媒体张冠李戴的歪曲报道，激起了全球华人和国际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在展览第四部分第二单元“骇人听闻的拉萨‘3·14’事件”图片前，一位西方记者对当时西方一些媒体的歪曲报道发表看法说，这确实是西方一些媒体犯的一个错误。

针对达赖提出的所谓“大藏区”问题，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张云博士现场解答了境外记者的提问。张云说，改变现状，把所有藏族人集中在一个“大西藏”里是不现实的，因为青藏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流融合之地。事实上，“大藏区”的概念产生在辛亥革命后。为达到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目的，英国代表1913年到1914年在印度西姆拉举行的会议上，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与旧西藏地方代表进行了秘密交易，企图迫使中央政府同意西藏“独立”，并将原属新疆、青海、四川、云南等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西藏，而西藏把辖下9万平方公里割让给英属印度作为回报。但是，由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拒绝签约，这个交易没有达成。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另一名研究员德吉卓玛教授则以亲身经历就藏族妇女地位变化问题回答说，作为一名藏族女性，自己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这在5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时藏族妇女的地位极为低下，一条草绳就能换一条妇女的命。而如今，藏族妇女撑起了半边天，活跃在教育、医疗、科技等各个领域。

南非广播公司驻中国首席记者约翰说，作为来自非洲的主流媒体，客观和不带偏见是他的工作原则。约翰坦言，对西藏，他知之甚少，但那是一片让人向往的圣地。他已经开始盘算着前往西藏的路线。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驻京记者马苏德说，他还没有去过西藏，不过已经读了很多关于西藏的书籍，很想去西藏看看。巴基斯坦读者对西藏也很感兴趣。他认为，展览的积极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可以让不同年龄、阶层、背景的人们对西藏的历史发展有更多的了解；二是可以减少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时常常会有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说，外国人对西藏还很不了解，像这样的展览应多多举办。

（本报记者 **吕 鸿 李 锋 董 力 牛瑞飞**）

十四世达赖喇嘛有多少资产

■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其中价值数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100多件

■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陈菲**）最近，本社接到不少读者来信，询问十四世达赖当年有多少资产。现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提供的资料，答复读者的关切。

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其中价值数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100多件。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西藏人民灾难深重、生存维艰，西藏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

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约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是农奴，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种份地维持生计。另有约5%的“朗生”是世代奴隶，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据17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约有耕地300万克（1克约合1亩），其中30.9%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此后，三大领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

据统计，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农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相当于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银200多万两，牛羊300头，氆氇175卷。

历代达赖喇嘛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孜布”和“孜穷”，把每年对达赖的部分“供养”收入作为高利贷放给群众，牟取暴利。据1950年这两个放债机构账本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81两，年收利息303858两。西藏各级地方政府设有为数不少的放债机构，放债、收息成为各级官员的行政职责。根据1959年的调查，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三大寺共放债粮45451644斤，年收利息798728斤；放藏银57105895两，年收利息1402380两。高利贷盘剥的收入占三大寺总收入的25%至30%。

徐才厚会见董赵洪娉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记者**曹智**）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18日在京会见了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夫人董赵洪娉女士为团长的香港群力资源中心访问团一行。

塞舌尔国民议会议长将访华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邀请，塞舌尔国民议会议长帕特里克·赫米尼耶将于22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戴秉国离京出访越南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国务委员戴秉国18日下午率团离开北京前往河内，开始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并与越南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家谦共同主持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王家瑞会见尼泊尔客人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中联部部长王家瑞18日在北京会见了由中央委员巴拉特·莫汉·阿迪卡里率领的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代表团。

就有传闻称中方考虑从菲律宾撤侨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8日就有传闻称中方考虑从菲律宾撤侨回答了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有消息称，针对菲律宾通过涉及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海基线法案，中国有关部门开始研究从菲律宾撤侨。请问是否属实？

秦刚说：上述消息纯属无中生有，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上接第一版）希望双方精心组织实施好友好年活动，为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活力。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朝友好年”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中朝友谊之树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金英日在致辞中表示，朝中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朝鲜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朝中友谊，推动朝中传统友谊的不断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今年是朝中两国建交60周年，两国政府将今年确定为“朝中友好年”。朝鲜党和政府将与中方密切配合，为“朝中友好年”各项活动的成功举办，并取得丰硕成果而做出积极努力。

随后，两国总理和首都2000余名观众共同欣赏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歌剧团、北京舞蹈学院，以及朝鲜万寿台艺术团、血海歌剧团和国立民族艺术团等中朝两国国家级文艺团体共同演出的“中朝友好年”开幕式演出《友谊颂》。两国200多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博得了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中朝友好年”开幕式由中国文化部和朝鲜文化省共同主办。

姚锡华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光明日报社原总编辑姚锡华同志，于2009年3月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姚锡华病重期间及逝世后，胡锦涛、李长春、习近平、刘云山、李源潮、曾庆红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姚锡华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44年5月在苏北盐阜地区参加革命少年儿童组织新安旅行团并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10月，在山东惠民市民运部任干事。194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5月，任惠民市城关区青联主任。1949年7月任《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后调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教育科、团校宣训班工作。1953年3月任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讲师、教研室室务委员。1958年后历任《红旗》杂志社哲学组编辑、历史组副组长、社党委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文革”初期受到冲击。1969年后历任广东省科教办公室副主任，广东省高教委员会党委书记，广东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82年11月，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87年3月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姚锡华是中共十三大代表。